

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

新都市 小说选

● 徐剑艺选评



浙江文艺出版社

I 247.7
8738

I 247.7
1371



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

新都市小说选

徐剑艺选评



10023214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罗俞君

封面设计：梁 璐

新都市小说选

徐剑艺 选评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文一路翠苑二区)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290000 印数00201—5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585-7/I·546

定 价：6.95 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我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创新意识的小説，无论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还是审美观念，与前几年的作品相比，都别有一番洞天，体现了小说艺术的深层变革。基于这个创作背景，我们选编了这套“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时间上以镌刻着小说观念深刻变革的1985年为分水岭，根据近年小说的创作现象，分为新写实小说、新笔记小说、新实验小说、新历史小说、新乡土小说、新都市小说等六种。

一部文学史，就是文学创新的历史。小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新”的终极追求。尤其在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甚至守旧倒退，都是与时代的要求不相符的。改革开放需要探索与创新，文学创作亦然。我们推出当代小说的“新”字系列，其目的，也是为了呼应时代精神，奖励文学创作的积极探索，并为当代小说的新发展，提供一个大致清晰的清晰而生动的轮廓。

由于近年小说创作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套丛书的编者，也力图切合小说创作实际，不作创作思潮或流派的生硬划分。我们认为，外国的创作思潮和小说观念诚然对我国当代小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当代小说中亦确实出现过一批摹仿、学习、借鉴他们创作方法的作品。但他们的创作思潮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我国当代的小说思潮，所以，用国外的一些创作

方法，诸如“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等来套当代中国小说，无疑是牵强的。同时，我们亦尽力避免用流派的角度去规范当代的小说创作。虽然流派在当代中国文坛还是存在的，但更普遍的情况是，一些创作方法、审美意识、艺术追求基本相似的作家、作品，常是松散而不自觉的集合，从一个角度看，他们有许多共同点，换个角度，他们作为流派的一些重要特征又消失了。应该承认，当代小说中的某些群体性倾向与发育完全的流派之间尚有着一段距离。因此，我们只从当前小说创作的一些现象出发，作大致的归类划分。这并不意味着这中间有多么严密的科学性。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更符合当前中国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正因为这样，有些作家出现了交叉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

为更全面地体现近年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我们在每种选集前由编者撰写《导论》一篇，系统论述这一创作现象；每篇作品之后，都附有短评，便于读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此外，我们还在书后附上作品要目，供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查阅。我们希望这套“新”字系列，既是近年小说创作现象的展示，又作为扎实而丰富的小说创作、发展资料，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年4月

导 论

徐剑艺

创造了城市，就意味着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项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而这一分离的人类社会学结果，就是把人分成了“城市人”和“乡村人”。

如今，尽管广大的乡村在逐步“城市化”，但人们还是能发现城市生存和乡村生存的距离。就是在最发达的国家中，人们也可以在大都市的街道和超级市场上发现种种“乡下人”。这也许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当许多乡村变成城市的时候，而许多城市又变成了都市……

在中国，随着摩天大楼、立体交叉桥、航空港等一系列现代化大都市机器的出现，城市人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新的生存境地。这个生存境地由这些意象构成：“广告牌”、“电视”、“咖啡厅”、“的士”、“模特儿”、“自选商场”、“卡拉OK”、“足球迷”、“股票交易所”、“流行音乐”、“独身者俱乐部”等等、等等。生活在这个“旋转着的世界”中的城市人于是就出现了西方人已经出现过的，如今还方兴未艾的“现代都市综合症”：如

“时空逼迫”、“孤独”、“焦灼感”，还有“金钱狂”、“瘾想”等等。

这也许是高科技和商品社会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副作用”，正如先进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同时带来了现代污染，极为尖端的新科学同时带来了核放射一样。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新时期的城市文学也发生了一个时代性的变化。

由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使得传统中国成了一个“乡土中国”。在这个由封建制度和半原始农耕生存相结合的社会结构中，尽管有着大大小小的“城池”和“都会”，但这些城市主要是因军事和政治的需要而设立的，并依靠军事和政治的力量或发展，或消亡。中国城市很少有像西方沿海商业城市群那样的独立性。它是军事的堡垒，政治的中心，而非商业和工业的中心。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经济。集居着军事和政治的统治者的大城市不是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推动城市经济，而主要是靠城市对乡村的税赋来维持城市的消费。因此社会学理论家们发现传统中国的城市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市民阶层。

城市中除了达官贵人以外就是他们的奴仆和雇用劳动者。极少的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是这架自给自足的城乡不分的大机器中可有可无的添加剂。所以，传统中国的城市是一个统治者和乡村富人的集居地（大多城市居民在乡间有田产）。它是消费乡村而不是消费自身的生产产品的一个社会。

一直到了近现代中国，像“上海滩”这样的具有商品经济

结构的城市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才在中国真正开始了它的左右整个国民经济的历史。尽管现代中国的城市深受国外侵略者经济的刺激和掠夺，变成了半殖民性质的畸形城市，但同时它也刺激了古老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并且它打断了自中国城市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对乡村的直接的依附关系。从此，完全意义上的以城市为生的真正的城市人就开始产生了。尽管这一代城市人是在外来殖民和本国封建压迫的双重灾难下勉强生存的。茅盾的《子夜》和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首次描写了这些城市人的生存困境和被扭曲的城市心理及精神分裂。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较早具有都市意识的城市文学作品。

然而，乡村和城市的冲突始终是中国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在这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小农生产的汪洋大海中，要产生一种与传统生存迥然相异的新的生存方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选择中，城市生存也许远远没有平和自然的乡村生存具有吸引力。中国人早已习惯这有史以来就身在其中的农耕乡村生存，以致于他们对土地、对庄稼、对村舍和乡亲有一种不可割舍的“乡土恋情结”。因此，中国现当代城市的发展中始终充满了种种城乡矛盾。描写中国城市的城市文学于是也就把这个冲突变成了它的重复性的主题。

新时期前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在小说方面主要是“市井小说”和“改革小说”两大类型。而这两大类城市小说的文化和审美模式始终没有超越城乡冲突这一传统格局。

“市井小说”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一大流派。几乎每一个城市中都有立足于本地域城市市井风俗区的市井作家。如这些作家与他们小说中的市井已广为人知：邓友梅与他的晚清京城市井，陈建功与他的当代北京市井，冯骥才的天津市井，陆文夫的姑苏市井以及冯苓植、叶之蓁、王安忆、程乃

珊等等小说家和他们所立足所描述的市井世界。

“市井小说”大多以文化学的视角来描写一个个大城市里的“村庄”，描写城市的老区居民以及他们富有传统的乡村化特征的生存方式，尤其注重古老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等地域性文化遗传。这是城市的过去，是城市文化的昨天。然而，在市井小说家这儿，这种城市的传统俗文化及生存方式大多被描写成一种美好的、充满人情味的、有着传统美德的和民族精神特征的温床。尽管这个世界中还充满着贫穷、落后、狭隘，甚至愚昧，它与咫尺之外的高楼大厦构成的整个都市大世界不相吻合。它仿佛是这个崭新的世界脱下的一件陈旧的外套。所以，在“市井小说”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这个世界充满人情人性，但是狭隘而又落后，是都市中的“小农文化圈”；而那个发达繁华的新世界充满生机，具有先进的科学和现代化的生活，但它同时也挤压着人，异化着人性。这是人类的不完美。这是每一种文明都具有的内在矛盾。然而在这里却体现为乡村和城市这两种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作家的审美选择来表现。在“市井小说”中作家往往体现出这样一个审美困惑：从人性的审美的选择中选择了市井生存，而在社会历史的价值判断中却选择了那新世界。自然，这种困惑的实质就是城市观念和乡村观念的矛盾。

与“市井小说”相比，新时期前期描写城市的“改革小说”的审美判断就没有如此的“二难”。改革小说中十分一致地体现出一种历史功利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即中国城市中原有的乡村化、封建化的体制必须改革，城市必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因此，改革和反改革的文化冲突又一次体现为城市和乡村、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在这些小说家描写城市改革的作品中发现这个文化冲突的模式：蒋子龙、水运宪、柯云路、

李国文、张贤亮、张洁等等。

除此外，1985年以前的新时期中国城市小说中还有一大批反映城市人的家庭、婚姻、性爱等道德观念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更为明确地表现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冲突：已经觉醒的人性要求和还处于传统乡村文化规范中的伦理制度的冲突，已经现代化城市化的生存方式和积淀在意识中的传统的乡村观念的冲突。比如在张洁、湛容、王安忆、张抗抗等女性作家的“女性文学”及刘心武、张弦等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就交织着这种新与旧、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冲突和精神痛苦。

等等。新时期前期城市小说在总体上没有超越“城乡冲突”这一审美模式。这一方面是由中国城市的现实冲突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城市小说家本身的文化属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必然会带上现实所赋予的“乡村化”色彩。它正如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作家刚刚从乡村和乡村文化中脱胎而来必然会带上他母体的特征一样。

只有到了中国的城市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渐渐摆脱乡村经济模式和乡村化文化观念的制约，在物质文明和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现代化，城市真正进入现代型大都市的时候，中国的城市文学才有可能摆脱这种城乡文化冲突模式，产生一种全新的现代城市文化范畴的文学格局。这个时机终于在1985年前后来到了中国文坛。当刘索拉、徐星、王朔、方方、刘西鸿、池莉等一大批青年小说家描写新一代都市人的作品出现以后，这种新的城市文学格局——即当代中国的“新都市小说”就开始形成了。

二

到目前为止，能够体现这一新的城市文学格局的代表性作品起码有以下这些：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多余的故事》，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城市的故事》，陈建功的《鬻毛》，王朔的《顽主》、《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等大部分作品；方方的《白露》、《风景》、《白驹》，池莉的《烦恼人生》，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爱人啊在路上到处都有》，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叶兆言的《采江菱》，刘毅然的《摇滚青年》，陈村的《愿意》及赵玫、吴滨、孙甘露、多多、皮皮等作家的部分作品。我们称这些作品为“新都市小说”，主要是为了强调这些作品与以往的城市小说相比所具有的两种新的文化品质。其一，这些小说在价值观念上，无论是作品中的都市青年形象的价值质，还是小说家对都市生存的审美化的价值表现，都是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所以，小说中的冲突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的冲突，而是传统观念和本世纪现代观念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新一代现代人格在与传统的交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新的“都市人”。其二，这些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相应采用具有现代主义性质的新的创作方式，表现出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作家对于他们所生存的新世界的感觉方式和艺术把握方式，由此形成一种与新的都市和都市人相一致的小说艺术形式。

现代都市意识是指本世纪以来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作用下所构成的现代化城市生存中形成的都市人的心理方式和精神内容的总和。这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体系。在总体上它是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相异的一种新文化。当

然，它包括现代都市人对于世界和存在，对于人自身及人所生存的社会种种价值观念。

对于小说家来说，他首先关注的自然是这种现代都市意识对于人本身的终极的影响，即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所奉行的现代主义人生观和生存行为。自然，这种新的人生观和生存行为最集中地体现在与大都市新的生存基础同时出现的年轻人身上。

我们发现，这些新都市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都是都市青年。这些青年人出生在大都市的摇篮之中，他们从小就习惯了现代都市大机器的喧嚣和旋转。当他们即将成年，即将作为一个独立的都市人在这个充满异化力量的世界中谋生存的时候，他们首先要战胜的不是来自城市的挤压，而是来自由所出的母体文化的迫力。所以，早期新都市小说中的都市青年为了开始他们自己的生存行为而不得不花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去同家庭及社会传统势力进行抗争。陈建功的中篇小说《鬍毛》是新时期中国新都市小说中较早的佳作。小说中的卢森是个二十岁的没考上大学而在大都市的马路上逛荡着寻找自己的活法的“自由人”。正因为这，他与“老爷子”开始了“两伊战争”。当报社总编的父亲指责他那头留得太长了的鬍毛的时候，他毫不理会。但是，当开发廊的盖儿爷出钱让他去哄他顽固的老剃头匠父亲的时候，他竟愿意让老头把他剃成“傻青儿”。这表现出卢森身上那种轻视正统人生价值观念，反抗家庭父母为代表的生存规范的个性精神。这种精神也许没有传统的崇高感，但它是符合现代大都市青年的生存要求的。

当卢森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念成为这一代都市青年普遍的共同的生存观念的时候，那么他们抗争的对象就不仅仅是家庭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传统势力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

的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的生存抗争就是以都市青年群体的面目出现的。这是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青年艺术家，可是他们的艺术生命被“贾教授”为代表的传统权威的力量所禁锢，于是他们只能以集体的疯狂来表达对于新的生存方式的欲望。尽管这之中有人变成了消极的逃避社会的“自茧者”（每日躺在被窝中企图来保全完整的自我），但大多数人则始终像贝多芬那样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因为这一代人坚信，除此以外，你别无选择！当然，在徐星《无主题变奏》中，这种都市青年对生存的反抗似乎消失了这样的热情。在《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身上，这种生存的苦闷和骚动、反抗的疯狂和愤世疾俗的激情全冷却下来了，变成了一种冷漠的、自我超脱的“局外人”意识。他不再与正统势力进行正面的交锋，而是转而沉浸于自己所寻找的新的世俗生活之中：他满足于在烤鸭店当伙计被人使唤，迷恋于下棋，玩乐，喜欢没有负担地交友，与异性相爱，同居。因为传统的人生观被否决了，而新的生存行为又一时难以充分实现，所以追求这种新的世俗乐趣可以填补精神的一时空虚，由此过渡到新的生存之中去。

王朔小说中的都市青年的人生行程大概就处于这个过渡之中。他作品中的男女青年尽管不是都市中的知识者，但他们也是极不愿意过传统的生活的。但新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又没有那种崇高的理想可以为之奋斗。他们是都市中的青年平民，除了青春他们就一无所有了。于是，新的生存就是具有人生乐趣的、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世俗生活。这样他们就自动地组成一个都市青年的生存圈——朋友圈，开始以消费为目的的新生活。这种消费主要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亦即“消费青春”——他们讲究生活本身的过程的价值，追求世俗生活的乐趣，以“玩”为人生的方式和目的。不求生存的深度，但求生活

平面的现世的生命意义。从社会的要求来说，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是没有参与意识和崇高感的。因此他们和他们的人生方式难以构成现代大都市竞争和突进的生存主流。然而从人的生命的本体要求出发，这种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倒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生存理想的：自由、轻松，无功利，使生命中的每一刻充满现世生活的世俗乐趣。

但是，在现实生存中，能直接进入这一境界的人是不多的。大多数人把此境界作为人生奋斗的目的，而把生命的过程作为达到这一境界的必然准备。于是他们的生命过程中充满崇高感和艰苦卓绝的受难精神。但王朔笔下的都市青年则是把这个过程本身作为目的的，是生命过程和生命价值的合一。所以他们直接进入这一境界，消费生命过程。我们可以不无戏言地说，王朔小说中的都市青年的生存方式和传统的人生的不同在于，他们把人们以往只有在晚上才有的生命过程移到了白天。他们的生命中没有了受难的白日人生。

与王朔笔下的青年相比，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中的孔令凯不仅有个性，又有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虽然她所追求的人生也不够正统和崇高（大学都不愿思考，尽做些模特儿之类的事），但她终究是充满天真和事业幻想的。她还是渴望成功的，一点儿也不消极，不无为，所以她更能代表现代都市，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的正在日益向上发展的都市精神的。因而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也就更能被中国各层次的读者所喜爱。

在体现现代都市青年新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中，千万不可忽略的是池莉新近发表的一篇名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短篇小说。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与前面所列作品的人物相比，可以说是没有个性的都市青年了。他们是纯粹的基层市民：三班倒的工人，公共汽车的驾驶员、售票员。可是他们

却丝毫没有对生活不满，尽管可想而知地受到都市生存的挤压，可他们没有现代都市青年所常有的那种精神的苦闷，人格的分裂，自我的沦陷等等。他们是凡夫俗子，他们只懂得如何活着，如何从生活本身找到无限的乐趣，连一支体温表被夏日的高温热炸这样的小事也感到无穷的生活乐趣。他们对生活坦然处之，无比满足——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他们仿佛是新市井人物。但是，这种追求现世生存的本体价值的人生观在本质上与王朔笔下的青年人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彻底的生活本体主义者、是有意的主动的“玩”人生者；而后者则是被动的自在的生存本体主义者。他们不是把夜晚的人生有意移入白天，他们的生存条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他们只是从白天的人生中寻求一点夜晚式的乐趣。王朔笔下的人物是“以玩作乐”，而池莉笔下的人物是“苦中寻乐”。所以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的主人公尽管不是都市中的现代派，但对于这些人物及他们的生存态度，作家的审美表现却是十分现代意识的。

三

与小说中的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精神内涵相一致的，是这些新都市小说所采用的有着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小说叙述态度和文本形式。

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新时期中国小说中在艺术形式上较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作品，大多是以都市和都市人为其表现对象的。这并不是说城市小说家一定比乡土文学作家更具现代意识或是先锋精神。而是说，以现代城市为艺术对象的作家更需要有与对象的本质相一致的表达媒介，尤其在小说这一特殊

的文体之中,叙述者、叙述方式与所叙述的对象的审美统一是最为必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意识流”、“黑色幽默”、“荒诞派”及“形式主义”作品往往不是描写乡土的,而是叙述都市的。

新时期中国的这些新都市小说,在艺术上相对一致地形成了一种可感性较强的具有明显的表现功能的艺术形式,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他们的“反讽叙述”和“都市俚语文体”。

反讽,在小说中既是一种叙述态度,又是一种叙述方式。作为一种态度,它是指叙述者和所叙述的对象构成的一种反常的关系,即叙述者对对象的态度不是直接的,而是隐藏的,并且是一种有意矛盾的双重态度。如表面上在颂扬对象,但隐藏在深层的态度则是深恶痛极的。但这种表达与传统的讽刺态度不同,反讽是绝不容许表达者有明确的主观倾向的,决不是讽刺者对被讽刺者的单向运动。反讽态度是一种彻底的自我讽刺态度,它在嘲笑对象的同时也决不放弃自我被嘲笑的可能。因此,反讽态度是一种宽容的人类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态度。所以在具有反讽性质的小说叙述中,叙述者的态度是十分隐蔽的。他不仅不直接流露对对象的好恶,而且还竭力排除情感的和道德的倾向。在新时期中国都市小说中一贯采用反讽态度叙述的作家是王朔、徐星、李晓等。下面一段叙述来自徐星《城市的故事》。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我”以反讽的态度叙述他和妻子在都市中的生存境遇。“我”和妻子在一间原先是厕所的七平方米的小屋中结婚,因此练就了像跳舞一样的行走习惯,以致于能够在桌椅床墙之间灵活地活动。一个意外的机会,他们搬进了一个大房间。然而他们却难以恢复原有的正常的行为习惯: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边看书边抽烟,请我老婆去倒

一下装满烟头的烟缸，她回来后习惯地迈地开了搬家前的舞步，我吃惊地看着她，她走了两步猛然醒悟，怔了一下，扑到床上嚎啕大哭。

我安慰她，她猛地坐起来眼眶里充满泪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我真受不了啦，受不了啦，我们赶快搬回去算了。”

我看着她那副期期艾艾的样子，突然被一股冲动搅得六神无主，我觉得她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楚楚动人，我扑上去想和她亲热一番，她狠狠地踢了我一脚，骂我是个不合时宜的混蛋……

从表层看，这个叙述者对他所叙述的妻子及他们全家的遭遇并没有明确悲哀和愤怒之情，而且在妻子大为悲恸的时候还“想和她亲热一番”。但是隐藏在这荒唐的叙述层面之下的潜在态度则是对妻子及自己的生存境遇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感。这是现代都市中被逼迫的生存者所具有的典型的人生态度。面对难以改变的生存困境，他们无能为力，只有以自我嘲讽的生存态度来反抗和超越这个人生境地。

那么小说中这种反讽叙述态度是如何构成的呢？这是由具体的反讽叙述形式创造的。作为叙述方式的反讽有两种形式：一种由情景而生，一种由语言而生。上例反讽的意味来自于小说文本的上下文反讽情景。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本来是“妻子”的丈夫，是恩爱的共患难的家人。当妻子悲哀时本当与妻共哭，这是正常的情景。可小说中的“我”则不合时宜地产生了与此相反（想亲热）的情景。于是上下文之间构成了一种可笑的矛盾。而这种可笑又是由我以佯装的不知情的态度叙述出来的，因此就具有“自我可笑”的反讽效果了。这之中的关键